

書評：評黎海超，《金道瓷行：商周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劉 靜 *

壹、前言

《金道瓷行：商周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一書為黎海超碩士學位論文的出版，作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商周考古方向畢業的博士，作者賦予了原始瓷起源課題一個較為寬廣的架構，不只局限原始瓷生產地的南北之爭，更將陶瓷生產起源問題與同樣仰賴高火溫的青銅器生產，這也是本書書名之所以取名為「金道瓷行」的原因之一。¹ 同樣的問題，若交由陶瓷研究者處理，則容易陷入手工業的研究邏輯中，更多關注產品特色、生產的工藝技術、方法、工具、窯爐、規模和特徵等問題，稍稍弱化了古代陶瓷生產與當時社會網絡流通的關注；例如浙江省考古所的謝西營於2014年發表的〈商周原始瓷器研究綜述〉，乃是使用了陶瓷考古研究者的角度對原始瓷器的生產進行了分期，其分有三：一、第一階段從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期。二、第二階段自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中期。三、第三階段為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中期至今，綜合考慮生產地並分期、分區，提示了不同時期的二手研究中討論的相關議題，並分別以科學元素檢測的研究手段對研究的推進，及綜合考慮的兩個里程碑，推進現有研究成果。² 就研究史綜述的角度而言，謝西營的確大量收集了生產地一手材料的文章，窯址簡報及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更

投稿日期：2023年7月27日；通過日期：2023年12月20日。

*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研究助理。

1 黎海超，《金道瓷行：商周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2 謝西營，〈商周原始瓷器研究綜述〉，《東方博物》43輯（2012），頁68-77。

多帶有探索「瓷之源」意識開展的課題，並將之依年代稍事分類，相反地，卻忽略了其他語種的二手研究論文，對陶瓷課題研究回顧而言，是很可惜的一種做法。

本書架構共分 5 個章節，畢竟還是學位論文，緒論仍然保留著教科書式的研究動機、對象、範圍、目的、方法和文獻探討等研究生訓練基礎資訊。第一章與第二章討論商代北方地區的印紋硬陶與原始瓷器：前者第一章分述兩產品的類型學分析與區域性研究，最後合併討論兩者的文化屬性及其相關問題；後者第二章討論兩產品的南北流通問題，3 個節次依序討論早、中商時期、晚商時期及窯爐證據。第三章及第四章討論西周時期北方地區的原始瓷器，由於商與周的原始瓷器交互（exchange）模式不同，西周時期原始瓷器的寫法並未完全與商代原始瓷器的寫法對齊：前者第三章一樣以類型學分析及歷時性變化和區域性特徵界定此時期北方地區的原始瓷器，第三節、第四節分別提及族屬、等級及組合問題和與其他器物及硬陶器的關係；後者第四章標題為西周時期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3 個節次先談南方地區原始瓷器的類型學分析，次談原始瓷器的刻畫符號、隨葬組合分析，三談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乃依據第一、二節的歸納結果立論。第五章定名為流通與社會，乃從資源與社會、中心與周邊、貿易與互換 3 個節次來談，前面的 4 個章節如果都在分析、歸納基礎材料，整理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的關聯性，那麼第五章就是全本論文的精華重點所在，除了點出全文結論，更積極的意義在於套用考古社會學的理論模組來解釋原始瓷器在商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解釋商代至周代的進程中，原始瓷器的貿易地位是否有所變化？橫向時空中與印紋硬陶的關係是否有所變化？兩者的是否具有相同、相同、相斥、互補、抑或競爭？第六章為結論，列舉全書結論並提出受限於考古材料限制之下，日後或有可持續發展延伸的課題。

貳、研究回顧

當談到原始瓷，從字面上的意思解讀，為瓷器製造的原始階段、前期階段，並暗示著製造技術上從陶器發展至瓷器的進程，且為單方向線性的單一發展，然而陶器與瓷器的基礎定義除了叩聲差異、吸水率、燒造溫度

等區別，原料的使用上才是最根本的分野，兩者分別使用了陶土或瓷土，才是辨別陶器與瓷器的命定課題；而日本學者弓場紀知也點出了中國研究者與日本研究者在陶瓷史研究上的盲點——即陶器與瓷器分類定義上標準的不同：中國學界慣用的陶與瓷二分法實際上包含了許多模糊地帶，中國學界對瓷器的界定範圍包含了英文所謂的炆器（stoneware）及瓷器（porcelain），瓷器歷經 1200 度以上的燒造。³ 換句話說，在陶與瓷根本定義下的不同，與陶演變成瓷的設定有著根本上的區別，那麼原始瓷器介於陶與瓷之間的設定也純屬虛構，這在謝西營研究綜述中分類歸屬第一期。從李濟 1929 年在殷墟的發掘開始，首次使用「釉陶」這個名詞，⁴ 日本學界也是將這種「原始瓷器」的狀態歸類於陶器，⁵ 然而釉陶另有所指，從字面上看起來，釉陶是指施釉的陶器，就基本定義而言，並不能完全指稱瓷器的原始狀態，考古工作者陳彥堂也撰文釐清釉陶名詞使用上指涉的誤區；⁶ 直至安金槐開始，才開始使用「原始瓷器」這樣的名詞。⁷ 於此同時，弓場紀知的文章也提出了日本學界慣用的另一個名詞——「灰釉陶器」，但文章初始也點出該稱謂或許不能很好的稱呼原始瓷器，因為灰釉陶器在現代日本仍然持續生產。⁸ 不同的是，華語研究者將原始瓷器歸類於瓷器的前置階段，但不屬於瓷器的範疇，然而不是瓷器，難道就是陶器的二分法嗎？日本研究者將原始瓷器稱呼為灰釉陶器，但陶與瓷根本的區別上在於材料使用上的不同，致使陶與瓷的成品上有吸水率、叩聲及胎質細密程度等的區別，本書作者代表著某部分的華語研究者並不明確陶與瓷的基本定義，將陶、瓷，甚至是否施釉混為一談，這反而呈現了原始瓷的課題尚未解決。

3 謝明良，〈中國早期青瓷雜識——從年喜文教基金會藏品談起〉，林淑心、謝明良、張偉華主編，《千峯翠色·越窯特展》（臺北：財團法人年喜文教基金會，1996），頁 19。

4 李濟，〈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北平：中央研究院，1930），第 2 期，頁 219-252。

5 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岡村秀典、徐朝龍編，《日中文化研究第七号長江文明特集》（東京：勉誠社，1995），頁 91，表 1。

6 陳彥堂，〈中國陶瓷史上的兩次誤讀及其匡正——兼及「釉陶」概念的源流〉，《華夏考古》3 期（2021），頁 148-157。

7 安金槐，〈談談鄭州商代瓷器的幾個問題〉，《文物》8、9 期（1960），頁 84。

8 事實上，從更早以前的岡村秀典早已將灰釉陶及原始瓷的名稱並列，弓場先生的文章是以陶瓷研究者的觀點，將日本學界對原始瓷器的探討做一總結，詳見弓場紀知，〈中国の磁器の起源——いわゆる「原始磁器」の陶器史上的位置づけを中心に〉，《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第 5 号（1999），頁 119-148。

學界對於原始瓷器課題的探索，從原始瓷器初始燒造的時間，原始瓷器如何演變，原始瓷和青瓷的關係，⁹ 原始瓷和印紋硬陶的關係，原始瓷生產窯爐與技術的問題，¹⁰ 到原始瓷器生產地與消費地的媒合等議題。原始瓷器所見的出土地雖然大多遍地開花，但某種程度集中於商周時期的北方，這是與重要大型商周遺址集中於北方，特別是鄭洛地區及豫北冀南地區，如鄭州商城、殷墟遺址等殷商晚期大型遺址活動範圍重疊相關，但相較於生產窯址的發掘，消費地的發現雖然片數較少，但品質仍然優於生產地不成比例的發現；而真正生產燒造原始瓷器窯爐的發現屈指可數，且屬於消費地的發現集中於商及西周時期北方地區的黃河流域，然生產窯爐及作坊的生產地發現時間以春秋、戰國時期為多，且集中在南方地區的長江中、下游流域，尤其是江西、浙江、福建及廣東等地區生產及消費的情況大相逕庭，幾乎少有重疊，且浙江作為具備長期生產青瓷的條件及傳統，也因此對於原始瓷器的來源有了兩種看法：一為「南瓷北運」，持此說法者認為原始瓷並未在北方生產，而是在更有製瓷傳統的南方長江流域生產製造完成後，再運送至北方黃河流域使用，由於 1960 年周仁等實驗分析測試北方出土西周原始瓷化學元素組成與北方青瓷差異大，卻與南方吳越一帶生產的青瓷成分較為接近；¹¹ 另一為北方地區出土的原始瓷器即在當地生產，因可依歸北方高火溫熔鑄製銅的傳統，短程運載，較符合成本利益，且原始瓷器器形及裝飾與北方出土印紋硬陶更為接近，然而在北方有尚未發現足夠多共燒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的窯爐，原始瓷器是否於北方就地生產仍具爭議。倘若原始瓷器在北方即可生產，那麼又為何極度少見北方燒造原始瓷窯址發現呢？關於原始瓷器生產窯爐的討論也相對缺乏，研究者仍然置於窯爐技術線性演進發展史脈絡下解釋，採取從「原始的」圓窯（饅頭窯）演變至升溫技術較佳的龍窯，然而窯爐造形乃是因應南北方不同地形的建造，不見得代表窯爐技術的演進，以書中所舉窯爐案例來看，北方早、中商鄭州商城 2 號窯、晚商的邢台東先賢 2 號窯、劉家莊北地 2008AGDDII

9 関口広次，〈原始青磁と青磁〉，東洋陶磁学会，《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学会，2022），頁 26-34；謝明良，〈中國早期青瓷雜識—從年喜文教基金會藏品談起〉，頁 19-49。

10 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頁 93-94。

11 周仁、李家治、鄭永圖，〈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9 期（1960），頁 25-31。

第 5 號窯、西周時代的天馬一曲村 I 第 101 號窯都是以饅頭窯的窯底建於平地，或掘地而起的饅頭窯形；相反的，作者所舉南方早商福建浦城貓耳山的半倒焰窯、平焰窯，晚商湖州南山 3 號窯、江西吳城與鷹潭角山的窯爐、西周德化遼尖山的 1 號窯及東周德清亭子橋 2 號窯都是依坡而建的龍窯，另有作者所舉之早商福建浦城貓耳山橫式升焰陶窯沒有燒造原始瓷器的發現，但底亦略帶斜度，屬於南方龍窯系統的窯形。何況龍窯較常見於有悠久燒造歷史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導致於西周早、中期的原始瓷器的核心生產區域為錢塘江流域，除此之外的浙東、閩北等處亦有零星地點生產。¹²

此外，原始瓷與青銅器同屬高火度，北方之所以未發現專燒印紋硬陶或原始瓷器的原因，是否就是因為搭載使用了銅器製造的窯爐和作坊所致？¹³而於商周時期墓葬、城址及居住遺址出土的原始瓷偶與印紋硬陶共伴出土，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發現不少兩者共燒的例證，兩者共享同時代、地域的裝飾紋樣，因此該書傾向探討西周時期原始瓷器南造的說法，倘若作者承認「南瓷北運」，那麼能區辨出地域分別的器形與紋飾又該如何解釋？豈是印紋硬陶與原始瓷一同北運？此外，印紋硬陶與原始瓷之間的器形互補及比較更是作者觀察及探討的重點。

參、「南瓷北運」

本書除去開頭緒論及結尾結語 2 章，中間主幹共分 5 章，前 2 章依序探討商時期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基礎分析及南北流通，第三章及第四章探討西周時期北方地區原始瓷器研究及南北流通，第五章綜合討論流通與社會。

第一章篇名「商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探討北方原始瓷器於早、中商的遺址中使用較為廣泛、普遍，且印紋陶與原始瓷器皆出土於高級墓葬之中，因此將原始瓷器視為一種珍稀資源，而在分期上

12 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頁 93-94。

13 田海峰，〈試談商周青銅冶煉和原始青瓷的起源的關係〉，《景德鎮陶瓷》總 26 期（1984 年增刊），頁 88-89。田文討論青銅冶煉與原始瓷器之關係是少見的嘗試，但其文排列印紋硬陶與青銅工藝演變歷程一致，原始瓷器隨後銜接的序列不受認可，與對原始瓷器的認知相扞格。

早、中商時期與晚商的社會情況與產品特色區別較大，因此可分為前後兩段。時、空間的分布上，印紋硬陶未廣泛使用，早商時限於鄭州商城與濟南大辛莊等少數遺址；中商時期範圍擴大，出土地點多達 6 處，皆為城址；晚商發現集中於殷墟遺址，範圍再度擴大，出土於城址與墓地。原始瓷分布方面也是多出土於遺址中，晚商時才有墓葬出土，但分布範圍反而早、中商比較廣泛，晚商分布密度小，且殷墟一期到三期空白，集中出現於殷墟四期，而晚商至西周初期在器形的聯繫上較為緊密，原始瓷豆也是在這段時間占最高的比例。

第二章篇名「商時期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作者比較商代南北各地城址、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並檢討燒造原始瓷器的瓷窯，較集中於南方，南方具有深厚燒瓷的基礎與傳統，作者贊成南瓷北運的看法，更積極的意義不僅於此，作者突破原始瓷產地的膠著，直面討論消費地墓葬及城址中原始瓷的發現，及其與印紋硬陶間的關聯性，存在互補情況，而商代的情況可分為兩個階段，前半階段為早、中商，後半為晚商，從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兩類器物的消長及流行趨勢來看，得出商人晚期對南方各勢力的控制減弱，透過商集團對長江中游盤龍城的控制，向外對南方其他城市的原始瓷產品有意識地挑選商代社會需要的器類，早、中期以原始尊為主，出土於高級貴族墓葬，晚期改為豆、一類的盛器，但晚期反而換作印紋硬陶較常出現於高級墓葬中，取代了原始瓷器於商代社會中的地位。

第三章篇名「西周時期北方地區原始瓷器研究」，西周早、中期的豆除了承繼商代晚期的餘緒，原始瓷器種類變得更加豐富，且出現於較高等級墓葬時，與銅器、陶器等年代序列完備的器物共伴出土，對原始瓷於社會使用的譜系能有較好的年代確立，然而到了西周晚期，原始瓷種類有所變化，數量再度減少。西周北方出土原始瓷的地區集中於「河南和山西」及「陝西、甘肅地區」2 處，前者原始瓷的種類及數量都較後者豐富，時間上也同樣證明了西周早、中期較西周晚期多元。從西周時期原始瓷器組合考察族屬及等級問題，作者另從墓葬中出土隨葬的原始瓷作考察，墓葬類型分為殉葬的商氏墓葬與不帶殉葬的周式墓葬 2 類，非以血緣姓氏區分，而是綜合殉葬及原始瓷器出土組合歸納得出，西周早、中期原始瓷器為殷

移民使用，西周晚期少見，出土原始瓷器的周式墓葬只見西周王朝的核心區域和少數姬性封國。原始瓷豆與硬陶甗的使用組合較為確定，漆器亦有較密切的聯繫，惟有機質易腐，至今漆器不辨其形，原始瓷器與墓葬中同出的陶器及銅器間未有明顯的關聯性。器形方面，豆始終流行，豆與高體疊的組合最為常見，墓葬等級較高的亦見豆、高體尊（疊）、矮體尊、罐成組，是較完整的組合，此外還有豆、罐組合。

第四章篇名「西周時期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首節「南方地區原始瓷器的類型學分析」整理南方地區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多為土墩墓，進行類型學研究，其原始瓷組合及與其他類器物的關聯性，如出土青銅器的高等墓葬多出土原始瓷豆，表示墓葬等級較高者多出土原始瓷豆，豆與罐的器形組合最為穩定，出土位置共伴，偶有罐為印紋硬陶罐的情況。南方地區原始瓷器生產的核心區域為錢塘江水系分布為主，浙東的黃岩等地次之，此外，寧鎮地區也出土了一些較具地方特色的器形，但是否能單獨成一個獨立的生產區域，作者持保留態度，基本上，南方原始瓷的生產地點與消費市場高度重疊，這與商代北方地區原始瓷統一由商人挑選控制，透過盤龍城向南方地區採買的方式不同，雖然這個時期仍是商族群的使用大於周族群的使用。第二節「原始瓷器的刻畫符號、隨葬組合分析」歸納蕭山地區出土 188 件器底帶刻畫符號的原始瓷器，在德清與蕭山的符號類別最為豐富，其他在蕭山柴嶺山、德清獨倉山及附近長興的刻畫符號皆可對應，呼應上一節所謂的南方原始瓷的生產地點與消費市場高度重疊及核心一邊陲分區，進一步得出南方原始瓷器生產當是以德清、¹⁴ 蕭山為錢塘江流域的核心區域，而這個區域也是近 20 年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重點發掘的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上虞縣商代印紋陶窯址發掘簡報〉，《考古》11 期（1987），頁 984-986, 10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浙江蕭山前山窯址發掘簡報〉，《文物》5 期（2005），頁 4-14；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縣博物館，〈浙江德清亭子橋戰國窯址發掘簡報〉，《文物》12 期（2009），頁 4-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浙江東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窯址群〉，《考古》7 期（2011），頁 3-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縣博物館，〈德清亭子橋：戰國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窯址發掘簡報〉，《文物》11 期（2012），頁 4-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東苕溪流域夏商時期原始瓷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地方。第三節「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分析南、北地區出土原始瓷器形，豆始終是南北方出土數量最多的器形，此外，尊或者折肩尊流行於北方，尊的器形變化從矮到高，矮體尊主要見於西周前期，另，錢塘江流域所見的尊多為盤口。湖南洞庭湖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便有燒造及使用印紋硬陶的傳統，晚商時期流行硬陶甗亦傳播至殷墟地區。¹⁵ 東周時期北方地區出土的原始瓷器極少，這也是作者在本書只探討到西周時期的主因。中央向生產中心訂製再將原始瓷器分配給各諸侯國的情況越來越集中，不過這不代表所有的原始瓷均源於訂製。有趣的是，作者劃分的生產中心為德清地區的錢塘江流域，南部的浙東地區屬於另一生產中心，北部的寧鎮地區尚難確認；與楊楠劃分的江南土墩墓比對：寧鎮區、¹⁶ 太湖——杭州灣區、黃山—天臺山以南區，共三個區域，¹⁷ 這種劃分方式與考古學文化分區並不重合，其中寧鎮區屬於吳文化遺存，在作者區歸類中，錢塘江區域包含後兩者：太湖——杭州灣區、黃山—天臺山以南區，生產原始瓷的中心與越文化較為相關，吳與越生產的原始瓷器存在不同的文化脈絡。然而，在岡村秀典的分析當中，吳文化的寧鎮地區存在少量的硬陶，器形以罐、豆、盆等食器組合為主，原始瓷器晚硬陶一期出現，¹⁸ 而抱持著北方出土原始瓷器源自於江西，轉到吳城文化的學者也在所難免。¹⁹

第五章篇名「流通與社會」，文分三個章節：第一節資源與社會，第二節中心與周邊，第三節貿易與互換。討論商周時期原物料或者產品的交換，筆鋒突然一轉，討論起過往從科學分析角度探討的銅原料的鉛同位素及銅料微量元素，惟銅料元素資料庫尚不完備，各實驗室分別做的採樣檢驗也可能存在誤差，因此不應該將科學分析數據並不該被視為終極參考值。銅原料銅容器及原始瓷作為社會流通的資源之一，可能同時受到政權支配或地方需求 2 種引力影響，進而造成原料及產品的流動，也是在這個章節，

15 書中提到湖南的燒造傳統自商代開始，詳見黎海超，《金道瓷行：商周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頁108。類似的觀點日本學者研究在前，洞庭湖燒陶的傳統早自新石器時代即發現63座饅頭窯，詳見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頁95。上述2位一手資料依據湖南省博物館、岳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岳陽市文管所，〈湖南岳陽費家河商代遺址和窯址的探掘〉，《考古》1期（1985），頁1-6。

16 楊楠，〈商周時期江南地區土墩遺存的分區研究〉，《考古學報》1期（1999），頁64。

17 楊楠，〈商周時期江南地區土墩遺存的分區研究〉，頁56。

18 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頁95-96。

19 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紋陶、原始瓷燒造地區的探討〉，《考古》10期（1993），頁936-943。

才真正的扣合書名《金道瓷行》的意義。第二節中心與周邊總結前述章節結論：早、中商的商集團透過長江中游的盤龍城收集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的原始瓷製品至中游的盤龍城，再統一運往商城，而西周時期的原始瓷發現，往往也跟殷遺民在墓葬中的使用較有關聯，中央訂製的情況更集中，從生產核心錢塘江訂製，集中送往陝西，再由中央分配給長江中游及山東等其他地方分屬，此時的原始瓷成為統治政權可調配的珍稀資源之一。第三節以 Colin Renfrew 和 Paul Bahn 的理論，將資源流通的 10 種形式套用於商及西周的貿易互換方式，²⁰ 惟作者也同意原始瓷實際的交流情形更為複雜，不該直接套用，也可能不只符合單一種模式，況且 10 種模式當中，筆者已沒有辦法挑選出任何一種，或者複數選項說明東亞秩序朝貢貿易的情形，這是因為 Colin Renfrew 和 Paul Bahn 是以西方實例觀察後作下的結論，簡單套用於中國早期資源流通實況將有其局限，遑論晚期中國。

肆、結論：多元並立的商周經濟社會與陶瓷手工業

當提到「原始瓷器」之名，若一下陷入陶瓷史的命題：即何謂原始瓷器？原始瓷器的起源是什麼？原始瓷器的定位，是銜接陶器階段至瓷器製作階段的轉折層次嗎？抑或陶器與瓷器是不同材料源頭的兩條發展支線？發展過程中偶有交集，多半時間是不同的發展方向，研究者若一下子進入陶瓷考古研究的語境中，會偏向原始瓷器的生產源頭，卻忽略了市場使用的流通面向。在研究重心始終糾纏於生產地的同時，本書另闢蹊徑重回使用地戰場，從問題的起始點解決問題，避免纏鬥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邏輯問題，不啻為一個巧妙的解套辦法；除此之外，解決原始瓷器起源問題事實上並非作者的本意，後記中作者提及：博士訓練期間所被賦予的命題是「資源與社會」，也就是說，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和「銅器、銅料、鉛料、錫料、玉器、玉料、馬匹、龜甲、海貝、鹽等」都屬於社會資源，甚至是惟有高

20 Colin Renfrew,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6th e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12), 347-380.

層貴族或國家力量才能掌握的重要資源，所以作者的擇選試圖搭載青銅器手工業製造及印紋硬陶等生產和交通情形，意在說明商周時期北方社會中的資源流通情況，這些資源包含原料及成品。原始瓷器在生活遺址及墓葬中的使用語境各有不同，恰巧再度回到原始瓷器製造的目的——即其使用方式。

本書如同作者自言：「本書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上也僅是嘗試性的，仍有很多的工作需要開展」，碩士期間以商代北方地區的原始瓷材料開始，博士期間再度收集商代南方地區的原始瓷的產地材料，並統整原本討論北方材料的問題起點，並分別發表了 4 篇專文，也形成了本書的 4 個主要章節，才改寫成今日所見的本書。全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將商代到西周的原始瓷材料以考古類型學的方法系統證明歸納呈現，作者所持的「南瓷北運」觀點在論述的過程中得到了逐步的證明，原始瓷器與北方陶器的器形或裝飾具相似性，乃是由於中央訂製、運輸，再統一分配給地方的結果，且這種情形從商代到西周有越來越集中的趨勢。本書並強調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的器形互補組合，然二者於生產窯址的狀況往往是共伴燒造，²¹ 乃至於共伴出土，單獨燒造原始瓷器的窯爐也存在。²² 不過本書探討的原始瓷使用時間僅限於商代及西周時期，最多延伸至春秋初期，並未拓展至東周時期的原始瓷發現，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於浙江的窯址發現更是豐富，直至東漢製造了真正定義上的青瓷，瓷器起源的問題才算暫告一個段落。而成書時間之後的一手考古發現，特別是近 5 年內浙江地區的生產窯址材料，多收於謝西營及鄭建明等人的文章之中。

另一層對本書的建議是希望見到更多同時期其他材質的重要資源討論，如書名雖為《金道瓷行》，亦將南北分區，統整幾個政治、族群及生產的核心分時代討論，立體化了原始瓷是否於北方生產的問題，也因此使讀者特別期待高火溫的原始瓷與銅器生產的關聯性，是否窯爐或燒造技術於銅器鎔鑄窯爐的技術上有所借鑑，且戰國時期多有模仿青銅禮容器之器形，

21 浙江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寧波市鄞州區文管辦，〈浙江寧波鄞州櫟斜老虎岩窯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 期（2011），頁 75-78、71。

22 鄭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的調查與發掘——發現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完整的龍窯序列〉，《中國文物報》（北京：2015 年 2 月 27 日），第 5 版。上述兩條註釋經余愛晶學友告示，特申謝忱。

使得研究者有意無意將原始瓷器與青銅禮器相互對比，然而從器形及出土組合的線索看起來，兩者並不具相似性，只是原始瓷器借用了青銅禮器的器名，然器形變化卻不見得相同，亦不具互補搭配組合。

此外，主角原始瓷器與印紋硬陶的競合關係尚未深究，兩者於兩周時期都有共燒的情況，然經確認發掘出土的窯址集中在今日浙江省境內及鄰近江西、福建等地區。²³ 陶瓷器元素分析的關鍵在於微量元素的成分與占比，但《金道》一書的方法非在援引比較科學考古分析結果，而是基於傳統考古類型學的器形比較及裝飾紋樣的比對。謝明良討論青瓷史文章承繼日本學術傳統，採用「灰釉器」一詞，避免陶與瓷基本定義的糾纏，直接討論各時期青瓷，包含原始瓷的演變。²⁴ 又如作者自言未納入釉陶、漆器等同時段珍稀材質的橫向關聯，若能結合同時期其他資源，如禮制用玉等更能代表國家級統治集團的質材，²⁵ 結合原始瓷生產材料的討論，則我們對原始瓷的認識，將原始瓷置於何種位置理解，也將受到改變。

綜上所述，本書是一部近 5 年來較系統性統整原始瓷研究的專著，並回歸到考古類型學中基本的分型定式方法，對出土材料進行分析，並採取國家社會對資源掌握、匯集與分配的高度，對原始瓷器控管的論述，體現了考古學者對原始瓷器作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研究方法，是 1 本較為標準的考古學位論文示範。另一方面，對於原始瓷器諸多延伸問題的討論尚未充分開展，本書選定的是從考古學角度出發，但作者對陶與瓷的基本定義並不明確，原始瓷器是否真如作者所認為的珍稀，恐怕也存在如作者於第二章商時期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南北流通所言：銅料資源才是南北資源流通的主要內容，後兩者只是附屬產品。在陶瓷考古研究方法上面，作者仍對生產窯爐、工具或社會經濟現況未有其他的闡釋，並仍保留許多陶瓷史可延伸的議題及研究須待解決。

23 近年浙江考古研究所於境內探討「瓷之源」課題的發掘成果，請參考鄭建明，〈原始瓷窯址考古新進展〉，《21 世紀以來瓷窯考古的新進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 1-12。

24 謝明良，〈中國早期青瓷史雜識——從年喜文教基金會藏品談起〉，頁 19-49。

25 將原始瓷器與禮制玉器共同討論是一項新的思考方向，此點蒙審查委員提點，特申謝忱。

伍、表格

表一 商、周時期原始瓷與印紋硬陶比較表

時代	原始瓷器	印紋硬陶
早、中商	1. 高等級墓葬中多，流行折肩尊 2. 北方鄭州 2 號窯 3. 早商南方福建浦城貓耳山橫式升焰陶窯半倒焰窯、平焰窯	高等級墓葬中少，尊形器最常見，不見硬陶甗
晚商	1. 高等級墓葬中少，流行豆、罐、壺等器形 2. 北方邢台東先賢 2 號窯、劉家莊北地 2008AGDDII 第 5 號窯 3. 南方湖州南山 3 號窯、江西吳城與鷹潭角山的窯爐	高等級墓葬中多，不見尊形器，流行硬陶甗
西周早、中期	1. 對晚商原始瓷器的繼承和發展，類型豐富、數量較多，屬於原始瓷的繁榮期。生產區域以錢塘江流域為核心，浙東、閩北等處零星地點為輔 2. 北方西周時代的天馬一曲村 I 第 101 號窯 3. 南方西周德化遼尖山 1 號窯	極少出土
西周晚期	原始瓷的衰落期，本書只探討商代至西周的原始瓷情況。	
東周	1. 以浙江地區生產之原始瓷的「瓷之源」課題展開，以德清為中心的東苕溪流域為發展核心區域。 2. 南方德清亭子橋 2 號窯	

參考書目

一、專書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東苕溪流域夏商時期原始瓷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黎海超，《金道瓷行：商周時期北方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Renfrew, Colin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6th e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12.

二、論文

田海峰，〈試談商周青銅冶煉和原始青瓷的起源的關係〉，《景德鎮陶瓷》，總26期，1984年增刊，頁88-89。

李濟，〈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北平：中央研究院，1930，第2期，頁219-252。

周仁、李家治、鄭永圃，〈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9期，1960年，頁25-3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上虞縣商代印紋陶窯址發掘簡報〉，《考古》，11期，1987年，頁984-986、100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浙江蕭山前山窯址發掘簡報〉，《文物》，5期，2005年，頁4-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縣博物館，〈浙江德清亭子橋戰國窯址發掘簡報〉，《文物》，12期，2009年，頁4-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浙江東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窯址群〉，《考古》，7期，2011年，頁3-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窯址發掘簡報〉，《文物》，11期，2012年，頁4-15。

浙江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寧波市鄞州區文管辦，〈浙江寧波鄞州櫟斜老虎岩窯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期，2011年，頁75-78、71。

楊楠，〈商周時期江南地區土墩遺存的分區研究〉，《考古學報》，1期，1999年，頁50-69。

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紋陶、原始瓷燒造地區的探討〉，《考古》，10期，1993年，頁936-943。

鄭建明，〈原始瓷窯址考古新進展〉，《21世紀以來瓷窯考古的新進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1-12。

謝明良，〈中國早期青瓷史雜識——從年喜文教基金會藏品談起〉，林淑心、謝明良、張偉華主編，《千峯翠色·越窯特展》，臺北：年喜文教基金會，1996，頁19-49。

謝西營，〈商周原始瓷器研究綜述〉，《東方博物》，43輯，2012年，頁68-77。

羅宏傑、李家治、高力明，〈原始瓷釉的化學組成及顯微結構研究〉，《硅酸鹽學報》，1期，1996年，頁114-118。

弓場紀知，〈中国の磁器の起源——いわゆる「原始磁器」の陶器史上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第5号，1999年，頁119-148。

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岡村秀典、徐朝龍編，《日中文化研究第七号長江文明特集》，東京：勉誠社，1995年，頁91-98。

三、報章

鄭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的調查與發掘—發現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完整的龍窯序列〉，《中國文物報》，北京：2015年2月27日，第5版。

